

野番茄

影片介紹

二二八事件，被認為是臺灣近代當中最深的歷史傷痕之一。而對於二二八，社會上常見兩種處於光譜兩極的詮釋：一邊將二二八事件的犧牲者們，皆奉為抵抗國民黨政府無道統治的勇士；另一邊，則強調反抗者們的暴力行徑，遂認為行政長官陳儀的鎮壓舉措行之有理。無論哪一種解釋，都充滿了英雄、家國等宏大的政治語彙，看不見除了鎮壓—受難以外的歷史經緯。而《野番茄》這部紀錄片，正是馬來西亞籍導演廖克發試圖以和緩的節奏、平實的敘述，呈現一種以小人物為歷史焦點的二二八事件。

以高雄為舞臺的《野番茄》，尋訪多位在1945年前後，生命出現重大轉向的人物。本片前半段，以奔赴東南亞的臺籍日本兵梁世令、二二八事件的高雄中學在學生陳仁悲與何聰明為敘事主體，讓他們娓娓道出太平洋戰爭當下及其後，他們的掙扎、猶疑，並向那本該平凡，卻蒙上厚重煙硝的短暫青春致意。

中後段的敘事焦點則轉移到王文宏、林黎彩兩位二二八受難者遺族身上。天真的青年王文宏，在稿紙上寫下父親「在二二八被壞人殺死」，讓家人嚇得連忙買通海關，將他送往巴西；林黎彩在父親的墓前，摘下墓旁結實纍纍的野番茄，一邊品嚐、一邊困惑母親為何哭倒在自己身旁。他們在敘述時，沒有眼淚、沒有吶喊、沒有仰天哭訴天理何在，而是靜靜地向鏡頭另一端的我們，陳述微小卻真實的劫後餘生記。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紀錄片，《野番茄》全片找不到任何一句口白。觀者只能藉由被攝者的字句、透過這些星點般的小人物歷史，漸漸拼湊出終戰前後，港都高雄的紛亂時局。

背景介紹：二二八事件及其受難者家屬王文宏與林黎彩

1945年，國民黨政府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指派具留日經驗的陳儀為行政長官，接收、管理臺灣。臺灣人原本期待國民黨政府，是一個新而平等的政權，怎知不出幾個月，經濟重創、政治腐敗、社會文化面又格格不入，且受盡「奴化」、「漢奸」的歧視，讓臺灣人對「祖國」失望。

直到1947年2月27日，查緝私菸誤傷菸販的事件，引起臺北民眾憤慨。翌日，民眾在臺北街頭發起遊行，到專賣局抗議、前往行政長官公署請願，遊行隊伍到行政長官公署時，遭到機槍掃射，數人死傷。民眾進佔新公園的臺灣廣播電台，向全臺廣播臺北發生「二二八事件」，批判陳儀政府貪污腐敗、民不聊生，號召民眾驅逐各地官吏以求自存，演變為全島規模的政治抗爭行動。

2月28日行政長官公署掃射民眾的消息，到了3月3日才由南下的青年學生傳回高雄市區。3日這天，約三十名士兵進入市區向市民開槍；高雄火車站更發生學生要求駐紮此地的憲兵撤出，但抗議群眾之一的雄中畢業生顏再策卻反遭憲兵射殺。高雄軍隊的行徑引爆民眾的不滿，他們紛紛包圍並焚毀高雄憲兵分隊、警察局器物的抗議行動。面對此般局勢，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緝隨即將高雄的抗議視作「急變戰事」，趕緊調派兵力，期望恢復維持秩序。

在此期間，緊鄰衝突核心高雄火車站的省立高雄第一中學（今高雄中學），聚集了高雄工業學校、高雄商業學校、高雄女中等四校的學生，並由雄中高二學生為領導，於3月4日組成了自衛隊——《野番茄》裡頭揮舞球棒的陳仁悲及李榮河，便是雄中高二生自衛隊的核心人物。

雄中自衛隊成員起先以維持校園及周遭環境的治安為首要任務，拒絕外校人士進入、拒絕參與校外的市民會議，以避免學校遭外人闖入，並保

護外省籍的無辜市民、教員。不過，到了3月5日，隨著市區衝突擴大，自衛隊成員組織部隊，試圖突擊趕走佔領高雄火車站的國民黨軍隊，以恢復糧食運輸與交通，只是行動以失敗告終。

後來，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炮轟高雄一中，軍隊架起機槍、迫擊砲直接向校內轟炸，並派員攻堅校園。所幸自衛隊學生已解散，躲開軍隊的搜捕，躲在校園內大部分是受到自衛隊保護的外省人。校長林景元卻在清鄉時被冠上領導無方的罪名被逮捕、被迫解職。至今，除了陳仁悲、李榮河等參與者的口述故事，雄中校內一面斑駁的紅牆還留下多處彈孔，見證當年學生們積極參與的史實。

不僅只學生們以武裝行動保護校園，苓雅區區長林界（林黎彩、林黎影之父）、高雄市議長彭清靠、日產清查室主任涂光明、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績、牙醫范滄榕、無線電信業者曾豐明等地方人士受到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在高雄市政府禮堂召開的大會推舉，在3月6日前往高雄要塞司令部，試圖與彭孟緝協商、談判。

談判過程被親自參與協商並倖存的李佛績清楚記錄了下來。當談判進行到一半，便出現士兵、警衛喝斥涂光明竟攜帶槍枝試圖槍殺彭孟緝，並隨即將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帶離談判現場予以扣留。但是，李佛績從頭到尾都沒有見到涂光明身上有士兵指稱的槍枝。

當涂光明等人被扣留後，彭孟緝隨即命令部隊徹底掃蕩市內的反抗勢力，兵分三路攻擊高雄市政府、高雄火車站及高雄第一中學，途中掃射無數無辜民眾，當時在高雄市政府禮堂等待談判消息的處理委員會成員與市民亦難逃一劫。這場鎮壓讓彭孟緝後半生都伴隨著「高雄屠夫」的惡名。

不過，事件並未終止在3月6日的鎮壓。談判當日被扣留的涂光明等三人，短短不到一周的時間便被判處死刑，於3月9日執行槍決。甚而為

處理苓雅區軍人遭打死而出面談判的林界，同樣受到牽連，在3月21日被處決。

在這場災難後，林黎彩回想兒時與母親上墳祭拜父親的記憶，那時的她年紀太小，還不明白母親的壓力和痛苦。一直到林黎彩就讀國小三年級時，二二八的創傷壓力和痛苦終究壓垮了母親，最終自殺身亡。此後，林黎彩和姊姊林黎影分別輾轉於五叔、四叔家中，寄人籬下。雖說是「寄人籬下」，林黎彩卻是眼睜睜看著五叔在母親離世不出幾個月的時間，住進自己的家中，讓年幼的林黎彩困惑不已；甚至，當林黎彩考得比五叔的孩子好一些時，五嬸就冷眼瞪她，或在五叔不在時罵她、體罰她。

另一位受難者家屬，則是事發當時僅僅一個月大的王文宏，其父、鹽埕區民代表王平水在高雄市政府前遭到彭孟緝軍隊殺害。二二八事件後，所幸王文宏母親王蕭受葉在鹽埕區開設的日式餐廳，受到港區周遭船員的歡迎，才讓王家不至於在失去父親後，出現嚴重的經濟困難。

但是，作為二二八受難者家庭，王家在白色恐怖時期仍被視作國民政府的眼中釘，不僅家裡時不時被警察敲門、查戶口，更要積極地向官員們送禮、包紅包。直到王文宏高中，因為在「我的父親」作文中寫下「我的父親在二二八被壞人槍殺」，驚動了教官與訓導主任，母親發動人脈擺了一桌酒席，賠禮道歉加上紅包攻勢，才將事情平息。在此之前，王文宏模模糊糊的印象中，盡是母親在鞠躬哈腰、為了生計逢迎達官顯要的身影。

彭孟緝、國民黨軍隊的槍彈在林家、王家開出傷口。林黎彩的四叔、五叔嚴厲且厚此薄彼的扭曲對待，以及王文宏目睹的官員醜態，都在他們的童年和心靈留下難以抹去的痕跡。

探討議題：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困境

在瞭解《野番茄》沉重的歷史背景後，我們能夠回過頭來思考，為何

片中不斷穿插看似充滿謎團的廢棄遺址畫面？以及受難家屬們的心理究竟處於什麼樣的境地？

日本時代的高雄港，被殖民者規劃成向華南、東南亞推進的重要據點，將高雄港打造為現代化、規模盛大的港口。它不僅被設計成吞吐大量貨物，更肩負拓展帝國領土第一線的軍事重任。因此，片中出现無數個地道、防空洞，或是軍事用途的要塞司令部、海軍設施，都是出自日本殖民者之手。建成的軍事遺址，在戰後絕大部分被當局棄置，數十年過去，儼然成了佈滿青苔、群聚蝙蝠的廢墟。但也有如要塞司令、鼓山洞等，被國民黨政府沿用於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的白色恐怖時期，在荒謬的戰爭歲月後，持續製造違背人權的殘酷歷史。

如今，我們反思空間與歷史記憶的重要關聯，並以「不義遺址」的概念解釋人權歷史與空間的關係。歷史並非船過水無痕，人權侵害事件必定有其發生的具體空間。保存並活化這些不義遺址，不僅是為了讓後人瞭解人權侵害事件的全貌，更可以透過保存過去的荒謬，對已發生的不義進行無聲的批判。

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時期，高雄存在許多不義遺址（如原高雄車站、原高雄市政府），卻沒有幾個處所被善加保存。我們難以辨認高雄隱藏的幽暗歷史，也難以描繪出「不義」的具體輪廓，如同《野番茄》鏡頭下的遺址，總是特別昏暗且令人感到壓迫，似乎正提示著我們，這些地方還埋藏著什麼，等待我們將這些過去攤在陽光下，重見天日。

另一方面，當我們聽見林黎彩怎麼描述自己啃著父親墓旁的野番茄、怎麼看待母親的離去、怎麼被親戚視作麻煩的境遇後，儘管他在鏡頭前呈現堅毅的一面，但不免好奇：他心理的傷，真的撫平了嗎？

就如同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們的證言，在白色恐怖時期，家屬們根

本不知道什麼是二二八事件、為什麼二二八奪去父親的性命。即使日後從旁得知二二八的梗概，這終究是個吐露不出口的秘密。作為受難者二代，他們往往只能選擇沉默，任由自己的心靈遭到蹂躪與孤立，甚至陷入「我的遭遇是應該的」這種自我懷疑。

針對受難者家屬及受難者的心理處境，最基礎的療程，便是讓他們說出壓抑許久的受難經驗。在威權統治時期，政治犯家庭受到當局的嚴正「關切」，周遭親友多半避之唯恐不及，使得受難者及家屬們受孤立、拒斥於社會之外。這般長期噤聲之下，即便到了威權統治結束後，他們或許擔憂社會大眾不諒解、或許早已內化扭曲的受難處境，讓他們持續陷入自我懷疑、自我噤聲，甚至於自我否定的局面。

當然，要在一瞬間就能夠揭露，並詳細地闡述數十年來的創傷，絕不是件容易的事；許多受難者和家屬，甚至直到晚年才意識到自己內心深埋的創傷。不過要能夠瞭解、分析並解決一切，最重要的，還是得從對外揭露、指認瘡疤做起，讓那道封存已久的傷口開始癒合。

聚焦臺灣：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的行動

《野番茄》前半段的被攝者們，講述彼此沉重的戰時經歷時，我們至少還能在他們追憶已逝歲月時，看見他們眼眸裡仍有不滅的那一點青春星火。相較之下，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王文宏與林黎彩，一個前往中正紀念堂示威，還與導覽員激辯一番；另一個則語帶些許酸楚地回憶往事，時不時還得留心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姊姊。兩位被攝者，似乎還有些什麼心聲仍隱藏著，但卻好像沒辦法大肆傾訴。

二二八事件已經過了七十多年，每年元首都會代表國家致上歉意，受難賠償也已做出相當成果，到底還有什麼值得傾訴？或許，王文宏向蔣介石銅像提出的抗議，即是他們心中，轉型正義工作的重要幾塊拼圖之一——

—加害者究責。

2022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完成階段性任務解散後，不義遺址、加害者識別兩部專法分別移交文化部及法務部，將由兩部會擬定草案。針對加害者的法制工作，牽涉加害者的界定範圍、罰則、救濟措施等問題，需要公私部門、立法部門更積極地思考與討論。尤其不同於其他法案，二二八據今（2023）已逾七十六年，仍在世的受難者極為少數，而受難者家屬也逐漸凋零。在不少受難者及家屬心裡，現在尚未了卻的遺憾，便是釐清到底是哪一個具體的對象，迫害了自己或自己的家人。

王文宏在中正紀念堂和導覽員激辯蔣介石的歷史功過並非突然，早在臺灣自由化、民主化後，他便透過組織「海外二二八遺屬返鄉團」、參與「臺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等方式，從1990年代開始向李登輝總統以及之後的歷屆總統們，表達對轉型正義工程的關切。他是長期參與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的倡議代表。

林黎彩則直到婚後數年，丈夫廖中山在黨外雜誌上，意外瞥見「林界」兩字，林黎彩才恍然大悟父親消失、母親離世的原因。因此，在1987年鄭南榕、陳永興等人發起二二八平反運動後，林黎彩也在丈夫支持下，一同參與1990年代以降的平反運動。1992年，林黎彩向法院控告彭孟緝偽造文書、非法處決父親林界，以及事後未按程序通知家屬領回遺體等罪狀。儘管他所控告的加害者們，後來仍未受到任何追究，但林黎彩直面國家暴力，追尋正義的精神，仍讓人感佩。

從他們的經歷可以發現，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們在1947年後，無法忘懷那年3月春天，自己和自身家庭所經歷的悲劇。不過，受難家屬們不是只默默承受那段悲劇，鎮日滿面愁容。我們更能夠看見他們的掙扎、他們的步履維艱，和他們在臺灣民主化進程中，為了平反與公義而懷抱希望、

奮力爭取的面貌。

延伸閱讀：

陳翠蓮（2017）。《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臺北：衛城

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惠等紀錄（1995）。《高雄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中下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

許雪姬、陳仁悲、林秀玲、林美蘭、劉瑞杰、吳榮發（2010）。〈「二二八事件與雄中自衛隊」座談會紀實〉，《高雄文獻》第 23 卷第 1 期。高雄，頁 129-146。